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繁荣发展文艺

□向云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高度决定眼界和视野，高度决定广度和深度，高度决定胸怀和情怀，高度决定境界和精神，高度决定信仰、信念和信心。习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为文艺工作确立了新的目标和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希望。这使我们深感任重道远，使命光荣。

一

新的历史高度，首先是我们必须站在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和优秀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上，开创当代中国文艺的新天地和新境界。中华文明有五千年以上辉煌灿烂的历史，是世界上传承不绝、代代相传、不断积累的独特文明形态，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幸福提供了滋养和保障，也为人类文明作出过伟大贡献，增添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奠定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也是东方文化的重要标志。五千年传承不绝的历史有力地说明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说明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教育、哲学、历史、宗教、文化、文学、文艺各个方面的有益力量。没有这样伟大的历史传统和文明滋养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没有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今天。习总书记多次论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我们今天的关系。他指出，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古代思想文化对今天仍然有很深刻的影响。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充分发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今天所具有的伟大智慧，也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多次在出访外国时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强调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强调东西方文明的和而不同，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识，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这是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或者说中华文明新的时代高度重新定位、认知、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和文明互鉴的伟大的实践范例，在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世界都将从一个伟大文明传统的继承创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当代的发展成就并对这个伟大文明的浴火重生给予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创造的灿若星辰的古代文艺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成果，是中华优秀文化和伟大文明上的桂冠和明珠。中国当代文艺是站在中华文明历史巨人肩膀上的当代文艺，也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能达到新的时代高峰，才能造就当代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中国特色、中国精神的文艺。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深深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高高举起让人动心、涤荡灵魂，让人发现自然美、生活美、心灵美，让人向上向善向真向美的中华美学旗帜，使我们的新文艺代表我们时代的风骨、代表我们时代的风貌、代表我们时代的风气，做时代前进的号角，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才能使当下文艺大有可为和大有作为。

二

新的历史高度，其次是要站在中国近代史以来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建设、改革、创新、发展的高度上，成就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新气象和新气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流血牺牲、艰苦创业的历史。人民至上是党的宗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是中国百余年来历史的主旋律。我们今天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总书记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作者的天职。”党的文艺工作史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史证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党和人民关系的一个历史折射或同体同构。无论是就文艺事业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而言，还是就文艺本身发展与它所反映的生活、人民、社会的关系而言，文艺的兴衰都取决于它与人民关系的亲疏。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大地。”假如我们离希望远而离欲望近，离高蹈远而离庸俗近，离思想远而离萎靡近，离精神快乐远而离单纯感官近，离坚定信仰远而离市场迷失近，离创造创新远而离抄袭模仿、千篇一律近，离三性统一远而离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近，归根结底都是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偏差，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出现了误读、误解、误会、误识、误区、误判。任何时候，这都是文艺的大是大非问题。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我们今天的成就和进步是我们的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中国奇迹。但是，我们的文艺远远没有把这种伟大的创造奥秘深刻而深情地揭示出来。我们甚至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沉迷在生活的欲望和欲望的生活中，我们的文艺作品不时出现娱乐无度、思想软化、精神萎靡乃至于因为沾满铜臭气而成为市场奴隶的现象，不仅不能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甚至还津津乐道于自己“低于生活”。这是文艺缺乏高度的一种表现，是文艺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的表现，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改正和纠正。重塑文艺的高度，重建文艺的高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必须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用文艺铸造强健的民族魂魄，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我们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坚持思想、艺术、市场上的共同成功，坚持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坚持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三

新的历史高度，再次是要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度上创造文艺发展的新繁荣和新辉煌。我们刚刚度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的喜庆节日。65年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是，中国人民在这个时间段内，创造了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中华文明曾经有千余年的历史遥遥领先于全世界，最近300年间西方文明科技领先，以坚船利炮横扫全球，并使中国遭受3000年未有之变局。但是，改革开放仅仅30年，我们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何等令人惊叹的奇迹。回首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为我们创造伟业铺就了广阔舞台。新中国成立65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为我们再创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文艺是时代之子，也是时代的感应器。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文艺，伟大的文艺必然是回荡着伟大时代风雨雷电的轰鸣。“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纪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指出了文艺创作的深刻奥秘，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时代的召唤，也揭示了我们的文艺何以有高原却无高峰、有数量却缺质量现象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色，也是我们发展成就最有力的发动机。改革开放不仅使我们融入世界经济大潮、步入全球化时代、迎来经济一体化、带来市场经济的红利，也使我们面临激烈竞争和挑战，面对着各种思潮的激荡和冲撞。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但是，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市场经济大潮使一些文艺创作迷失了方向，滑入了美丑不分、雅俗不辨、真假混淆、善恶颠倒、是非模糊的泥淖之中。惟利是图、见钱眼开、利润至上、利欲熏心、失德失范之类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向文艺创作渗透和漫延，考验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定力和艺术操守，检验着文艺作品的效果、品格和趣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和伟大使命。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文艺家都是这一文艺主旋律上的伟大乐手，古今中外一切伟大文艺作品都记录着一个个历史时代的最强音。中国在一个激烈竞争、世相纷繁、思想激荡、文化多样、价值多元、冲突不断、矛盾深刻、政治多极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和崛起，经受着各种各样的复杂考验。文艺具有教化、美化、德化的功能，文艺可以发挥宣传、审美、愉悦的作用，文艺具备思想、艺术、经济的价值，文艺可以影响政治、社会、宗教、法律、教育、科学等方方面面，文艺引领着世道人心、精神意志、风俗民情的内在气质和外在面貌。文艺从来就不是只发挥一种单一的功能、作用、价值、影响和力量。今天的时代能使文化如此便捷地传播、交往、交流，更不可能只视文艺为一种单向度的存在。恰恰是一些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应该走向丰富性的时代把文艺引入了片面的胡同。文艺工作者必须认识到我们肩负的使命责任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必须认识到人民实践和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创造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繁荣和新辉煌。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高望远，文艺才能目光如炬，烛照民族精神；志存高远，文艺才能引吭高歌，引领时代风尚。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社长）

我听到了生活的呼唤

□潘灵

上世纪80年代，对于“60后”作家来说，绝对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出生寒门的我们，抱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坚定信念，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时代骄子。书生意气，飞扬青春，在大学的象牙塔里，文学之梦正酣。国门洞开，思潮涌入，我们这些最初的“文青”，以文学的方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以文学的方式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心存“学得文武艺，货比帝王家”的志向，迷信“他人即地狱”的信条，我们头戴校园诗人或校园作家的桂冠，在四年不食人间烟火之后，被大学这熔炉一律吐了出来，进入了比象牙塔更复杂、更混乱、更功利、更世俗的社会。格格不入的我们，体会到的是种种不适。看着别人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后风生水起的人生，文人的那份骄傲随即被脆弱和自卑替代。好在还有文学，它成了我们自我拯救的福音。

因为文学，我们这些80年代的校园“文青”，一些被分配到了文化事业单位，一些后来想办法调进了文化事业单位，但更多的已改弦易张，做起了与文化毫不相干的营生。许多年后，被岁月和生活改变得面目全非的我们，惟一没改的是对文学梦想的那份赤诚与痴迷。

我18岁进大学，19岁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23岁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小说。大学毕业进了地方党政机关，蜻蜓点水后又调入省级出版单位，做着职业文学编辑，当着业余小说家，写着不痛不痒的文字，编着不冷不热的书稿，过着不富不贫的生活，赶着一个又一个跟文学有关又无关的笔会。渐渐地，文学的人生变得假大空起来。守着过去的点滴成就，顶着一方名流的光环，自鸣得意一阵后，才发现江山代有才人出，风骚也属他人。生活无情地将一个小说家闲置了，时代的列车远去，我才意识到我的书斋原本就不是火车头。

与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文学，自以为生就属于文学的自负，做一个优秀小说家的梦想，一切都虚幻起来，可疑起来。很多个夜晚，我独自一人，看窗外霓虹点点，夜色阑珊，我甚至怀疑，我选择的文学人生路，是否注定是一个错误？我向文友倾诉我的苦闷和不安，巴望他们能给我良方一剂，但得到的都是头痛医脚的处方。我说我是不是远离了生活，他们就反问我，难道现在你不置身生活中？我说，我远离的是激发我创作的生活，他们说那是你缺乏在自我生活中发现文学的能力。在经历了太多的酒吧长谈和沙龙争论后，我几乎空虚得如同一个空壳。

那年，我36岁。

带着解开问号、急病投医的迫切愿望，我进了鲁迅文学院首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跟一群才华横溢的来自全国各省区的学员成了同学，聆听了一群声名显赫的专家的讲课，仿佛真有了更上层楼的境界。四个半月下来，以为自此如有神助，佳作可期，但等我重新拿起笔才知道，一番学习下来，落了个眼高手低，头脑风暴过后，我的文学世界满目疮痍。

人生不得意，乡愁必来袭。身居闹市的我，在无数的梦境中，看到的都是故乡的模样，听到的都是故乡的呼唤。开着车，听着美国乡村歌曲《乡间小路带我回家》，我走在了回乌蒙山故乡的路上。翻过一山又一山，故乡近在眼前，却已面目全非，不再是记忆中模样。老旧的村庄被探矿人钻得千疮百孔的山峦，从前整洁的乡街子如今人声鼎沸、垃圾遍地，各种兜售枪支、春药和农用品的广告，将一面面土墙弄得乱七八糟。我见到了邻家大伯，隔壁婶娘，但人家不叫我小名，称我同志。我与儿时玩伴在小路上相逢，我递上一支烟，他看看烟，点燃，我说，从前……他说，不要提从前，你现在是城里吃皇粮的同志。小时无话不说的朋友，现在已话不投机。回故乡本想疗伤，但却被故乡乡亲羡慕一番，尊敬一番。我终于意识到，那所谓的羡慕、尊敬，其实是一种拒绝。我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再属于故乡。

——这，是乡愁之外，更大的愁！

虽谈不上落荒而逃，但真是黯然离去。我沉默着，开车离了故乡。回到昆明，打开电视，竟然是关于我故乡人的新闻：三个20出头的小伙子，合伙偷了辆奥迪，被抓了现形。问其作案原因，竟然是年关将至，想回故乡风光一把，所以冲奥迪下了贼手。一条原本属于茶余饭后市民谈资的新闻，看得我泪流满面。

我发现，我离他们——我的故乡、我的乡亲，真的越来越远。而离他们越远，我这大山出来的所谓小说家，离文学也就越远。

我要回去，远山在召唤，生活在呼唤。

我必须回去，文学在召唤，在呼唤。

40岁那年，我去了滇西保山市，挂职体验生活。我挂的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去坐了一个星期的机关的位子，我就烦躁不安起来，向市委书记提出，让我沉到基层去。我说我是作家，要生活，要素材。在他的直接关心下，我被派到腾冲县和顺镇的一个农户家，跟他们一起生活，了解翡翠文化，学习翡翠鉴别、加工知识。通过半年的学习、摸索，我把自己变成了半个玉石行家。又用了半年时间写出了《翡暖翠寒》的长篇小说，《十月》杂志发表后，作家出版社出版，并被改成40集电剧连续剧，在中央台和数十个地方台热播。接着，我借新农村建设的机会深入滇西农村，跟农民们同吃同住，跟他们拉家常，采访了数十个新农村指导员，写出了反映新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泥太阳》，《芳草》杂志首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最终获得了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一等奖，入选建国60周年500部优秀长篇。

挂职的经历让我尝到了深入生活的甜头。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作家，无论你有多高超的技法，如果没有生活做底子，没有生活的强力支撑，是断然难写出好作品的。到生活中去，沉到底层，就会有发现，就会有素材，就会有灵感。

挂职回来，我离开出版单位，调入省文联工作。我现在已养成每年必抽一些时间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习惯。我到滇东北乌蒙山区调研，发现这地方农村人口流失，乡村空心化问题突出，根据所见所闻，再佐之以艺术加工，我写出了中篇小说《一个人和村庄》，在《大家》杂志发表，《新华文摘》《小说月报》转载。

我的职业是文学编辑，我在编辑工作中也大力倡导编辑也要体验和深入生活，要身在其中。我担任《边疆文学》主编以来，一方面潜心扶持培养基层作家特别是少数民族作家，每年都有十数位不同民族的文学新秀通过《边疆文学》成为文学的新生力量。同时，我和我的同事们还积极主动关注社会生活，前后出版了“云南抗旱救灾专号”、“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专号”和“鲁甸803地震抗震救灾特大专号”。“鲁甸803地震抗震救灾特大专号”出版后，我们火速运往灾区，给恢复重建的灾区送去精神食粮。手捧专号，鲁甸震中龙头山镇龙泉小学校长这样对我们说：“你们送来的跟那些救命物资一样，都是灾区需要的。”

让文学在生活中生生不息；让生活在文学中焕发光辉。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更坚定了我深入生活，讴歌生活，做一个人民喜爱的作家的文学自信。

（作者系《边疆文学》主编）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推动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上接第1版）

近年来，互联网、电视等媒体蓬勃发展，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经验的深刻变化，改变了文艺评论的形态。网上评论、电视评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传统评论在内容、方式、语言上存在一定不适应。要因势而变，坚持创新创造，大力推进评论载体、传播方式、评论内容形式的创新，把网络评论、电视评论作为突破口，扩大主流评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利用好影响力资源，突出正面声音。评论要适应电视、互联网媒体的特点和规律，电视评论要紧密跟踪焦点问题，多角度报道、深层次分析，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媒体权威性。网络评论要快捷反应、加强互动，网上来网上去，评论及时到位，增强时效性和亲和力。要发挥好网台联动的积极效用，让文艺评论在全媒体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注重语言和风格的创新，内容深入浅出，语言新鲜活泼，风格质朴清新，篇幅短小精悍，网言网语、快人快语，贴近广大基层读者观众的审美习惯。

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是文艺评论不断发展的动力。唯有争鸣，才能有创造的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理越辩越明。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一团和气”不是良好的批评生态，“一评就跳，一评就骂”更不是衡文论艺的正常氛围。我们鼓励不同文艺观点、审美立场进行自由争论，提倡风格多样的评论形式。各级媒体，在舆论引导、社会宣传和大众传播上负有重要责任。要把握好学术争鸣与媒体责任、评论自由与宣传导向之间的关系，在繁荣中加强引导，实现健康有序的良性发展。专业性的评论期刊报纸更多鼓励思想碰撞和学术争鸣；大众传播媒体更多致力于用文艺评论带给广大群众思想艺术启迪，引领健康的文艺鉴赏。

敢不敢实事求是，是开展文艺批评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的原则，倡导公道直言、实事求是的评论风气。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之间，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要敢于实事求是，论理讲美，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要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文艺评论，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充分发挥好群众评论的作用。

文艺评论除了依靠评论家自身的努力之外，更需要行之有效的领导，提高工作的组织化程度，为文艺评论创造更好条件。要建立和完善文艺评论工作机制，集中组织重点评论项目，巩固和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巩固和加强文艺评论队伍建设。要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充分尊重文艺规律、尊重评论家的创造性劳动，不断营造有利于文艺评论繁荣活跃、宽松和谐的良好环境。

（原载于2014年第21期《求是》，作者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文艺报》第六届特约联络员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10月17日至19日，《文艺报》第六届特约联络员工作会议在湖南郴州召开。会议由文艺报社主办，湖南省作协、郴州市创建办承办。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各行业作协的代表30余人与会。《文艺报》副总编辑崔艾真、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游和平、中共郴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朱迎春出席。

特约联络员是文艺报社的一项常年制度。在全国各省区市作协以及各行业作协，均设有一名本报的特约联络员。目前，本报特约联络员已达45名，实现了对全国文学界的全覆盖。从人员结构上看，本报特约联络员一般都是各作协负责创作、组织工作的同志，不仅对各自作协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特约联络员既是我报与各作协联系的纽带，是我报获得各作协信息的通道，同时也在全国各作协之间搭建了一个探讨工作、研究问题、交流经验、共谋发展的平台。设立特约联络员制度以来，联络员为我报提供了大量的新闻素材，为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促进各地作协的发展和青年作家培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已成为本报与全国文学界相互联系和交流的重要桥梁。

2005年开始，本报根据工作需要，分年度连续召开了特约联络员工作会议，迄今已经召开了六届。本届特约联络员工作会议的主旨，是交流各作协对本报办报方针、联络会员、宣传发行工作等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各作协的代表还就今明两年各作协的工作部署进行了交流，对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交换了意见。

此次会议适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讨论和学习总书记的讲话，立即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与会者表示，要实现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作为作协工作的组织者和作家的服务者，我们必须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用文艺助推中国梦的实现，是中国文学工作者的使命。我们要抓紧学习和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在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专家研讨文学新变与文化自信

本报讯（记者 周玉宁） 11月1日至2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湖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文学新变与文化自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八届学术年会（2014）”在武汉举行。来自海内外的300余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与会，共同研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当下语境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出路。张炯、白烨、方方、孟繁华、於可训、陈晓明、陈福民、贺绍俊、张清华等专家学者作了发言。

此次年会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为应该认真贯彻讲话精神，做好文学研究工作。与会代表围绕变动的社会与文学发展、莫言的文学创作及当代文学评奖机制、新媒体文学与文化产业、中国各地域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当代文学经典与热点问题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发表了许多有建设性的观点。年会期间还举行了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对过去两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集中检阅。

在会上，有的代表提出了“失去青春的中国文学”这一现象，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严肃文学领域的青春形象逐渐模糊甚至退隐，与文化消费领域中狂欢的青春面貌形成鲜明比照。重建当下中国的文学青春形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文学要重新与青年建立起应有的关系，首先要塑造与这个时代青年生活有关的青春形象。而文学史为我们提供的有效经验，仍然没有成为过去。

与会者还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伦理问题，指出当下有的批评家不从文本出发就发出苛酷批评的现象，正是缺乏真诚心态的表现。我们要提倡说真话、讲道理，呼唤真诚的文学批评。

当下的文学生态系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不仅文学的外部环境变了，文学创作本身在日趋多元丰富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谈到，要辩证理解文化自信的问题。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文化自大。当下中国作家正在向民族传统叙事回归，这正是中国作家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

有些学者提出了“艺术何为”的问题，指出当前正值社会转型期，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对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普及提出了挑战。

陈超同志逝世

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河北师大文学院原教授陈超同志，于2014年10月31日逝世，享年56岁。

陈超，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生命诗学论稿》《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等。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